



党史研究与写作

● 王中杰 / 著 ● 春秋出版社

党史研究与写作

王 中 杰

长沙市卫生学校图书馆



CW0028949

春秋出版社

1988年·北京

党史写作与研究

王中杰

党史写作与研究

王中杰

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6.4 印张 137 千字

1988年1月北京第一版 198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册

ISBN 7—5069—0031—9/K·2 定价：1.20元

出版说明

《党史研究与写作》是一本关于中共党史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论集。作者王中杰同志多年来在组织领导湖南党史工作的同时，注重探讨党史科学研究与写作的各个领域，潜心钻研，勤于著述，撰写发表了多篇专文，受到许多读者的好评，并为一些报刊转载或摘登。现从中选取若干篇目，由北京春秋出版社结集出版，介绍给更多的读者。这对推动党史工作业务的科学性研究，提高党史专业干部的素质，是有益的。我们希望读者共同来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以促进党史史学理论工作的不断繁荣。

1987年12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一)

党性 史德 文采	(1)
怎样研究地方党史	(12)
拓宽党史人物传的研究面	(21)
党史写作浅谈	(33)
漫谈党史人物传记撰写中的几个问题	(45)
略论青运史的编研	(54)
《湘南起义》编研谈	(61)
不断提高党史资料科学管理水平	(64)
《湖南党史大事年表》撰写问题答记者问	(69)
谈党史专题的征集与研究	(74)
党史编研协作三题	(82)
党史工作漫谈(五则)	(92)
征史杂记(四则)	(105)

(二)

党的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	(112)
秋收起义前后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139)
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我们的任务	(147)

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初的伟大纲领…………… (161)

学习李维汉的治史经验…………… (169)

读新发现的杨开慧烈士诗文…………… (173)

革命历史题材是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 (182)

后记

党性·史德·文采

——谈谈党史工作者的修养

切实加强党史工作专业队伍的思想、作风与业务建设，是不断开创党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的新局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怎样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党史工作队伍呢？我认为，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要有坚强的党性、良好的史德和一定的文采，这是党史工作者修养的重要问题和做好党史工作的基本要求。

(一)

党史工作者要有坚强的党性。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忠实代表。我们党所固有的，明显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性，就是我们党的党性。

我们的党是一个有着4000万党员、60多年光荣历史的大党。党史是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英勇地同国内外敌人进行长期、复杂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是正确战胜错误、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是开拓前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在，我们征集党史资料、研究党史，是为了用党的纲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用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和革命传统教育党员和群众，使人们认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

律，为实现党的崇高理想、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因此，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必须充分认识自己工作的意义，加强党性锻炼，用坚强的党性做好这项工作。

党史工作者在党性修养方面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我想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阶级性。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性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党性的基本内容。列宁指出：“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党史这门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本身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它要求党史工作者必须用无产阶级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现在有一种论点，认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研究党史再提阶级性问题就没有必要了。对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且不说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也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港澳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也企图利用我对外开放之便，渗透、侵蚀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也要长期进行。所以，从研究编写党史这项工作来看，的确是具有阶级性的。张国焘写了《我的回忆》，王明写了《中共五十年》，司马璐写了《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陈诚的秘书王健民在台湾还写了一本《中共力量消长史》，和《中国共产党史稿》，李德也写了一本《中国纪事》，还有日本、美国等地一些学者也写了许多研究中共党史或重要党史人物的专著。他们中间许多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我党的历史或是严重歪曲，或是妄加评论，或是肆意篡改。即使一些

同情我党事业的进步学者，由于他们研究的角度、阐述的观点各不相同，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这些史著都只能参考，不可借鉴，更不能作为考证的依据。

因此，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在征集党史资料和研究党史中，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处处维护党的领导和党的形象，维护人民的利益和革命原则。做到爱憎分明，褒贬得当，宽严适宜。著书立说要充分注意到社会效果，使自己的工作对社会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对人民起教育鼓舞作用。同时，还要遵守宣传纪律，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党史工作者党性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和关于建国以来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是我们搞党史工作的依据与准绳，必须严格遵循，不能道三论四，甚至背离决议精神。研究可以有不同观点与看法，但发表时要持严肃、慎重的态度，遵守党的纪律，不能各行其是，搞无政府主义，或抢先发表。我们强调纪律性会不会损害历史的真实性呢？不会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历史的真实性是一致的，它不需要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掩盖自己的阶级利益，更不需要以造假来装扮自己的形象，实现本阶级的目的。无产阶级在历史上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无产阶级要解放人类、推翻不合理的剥削制度，这是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面对历史的真实，写出历史的真实。这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本质，也是我们强调党史的阶级性根本之所在。

二是科学性。党史是一门科学，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这项工作。

什么是党史的科学性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历史学中的统一，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研究党的历史。

坚持党史的科学性，首先要从社会的经济关系上去探求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动力，从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中去考察人们历史活动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告诉我们，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建国以前在我党历史上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各个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各种人物的发展变化，都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物，是不同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必然结果。只有紧紧抓住各种历史现象的经济根源，才能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其次，要把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人民群众，放在历史的主导地位，作为历史的主体和主人讴歌赞颂。在考察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变和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时，首先考察不同阶层的人民群众经济地位的变化，他们的政治要求与愿望，他们的智慧与力量，他们的英雄行为与献身精神，从历史的广度与深度上发掘与表现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导作用，展示人民群众英勇壮烈的斗争场面。当然，我们在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肯定领袖与英雄人物对推动历史发展、加速革命进程的杰出作用。那种肯定群众而否定领袖，或神化领袖而贬低群众的观点，显然都是错误的。在党史研究中，有人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竭力贬低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是很不应该的。国外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的“非毛化”反动观点，必须警惕和批判。再次，要用辩证的方法去研究党的历史。毛泽东1942年谈到，研究中共党史要用全面的历史

的方法，就是“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我党60多年的历史纷纭复杂，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中，敌我力量的消长、阶级关系的变化、革命力量的组合、历史人物的出现、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党内斗争等等，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每一个变化都有它客观的和主观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军事的诸方面原因。因此，我们在研究这种变化时，不能带任何主观随意性和片面性。必须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它发生和发展的各种因素和全部过程，充分地占有材料，从事实的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作出正确的结论。切忌把一些片断的、个别的、表面的史实，当做完整的、全面的史实，草率地作出结论。

归根结底，坚持科学性就是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反映历史。毛泽东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三是实践性。历史是实践的记录，实践又是检验历史真伪的唯一标准。历史上许多现象当时看得并不清楚，但是，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实践揭开了历史的面纱，暴露了它的真貌，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最后胜利的反反复复实践。检验党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

实践。我们研究党史，不能从抽象的定义或本本出发，而应该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依据，大量地占有材料，运用实践第一的观点去分析研究，求得正确的结论，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比如对建国以来出现的两个马鞍形，特别是十年动乱带来的惨痛教训，都只能用实践的观点去总结，不能另立别的什么标准，如“出发点”之类。离开了实践这个标准，不仅会导致理论上的荒谬，而且会歪曲历史，失真于民。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全党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使我们解放了思想，突破了党史研究上的一些禁区，为活跃党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二)

党史工作者要有良好的史德。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美好品德的民族。做工行商、著书立说，都讲究职业道德。搞历史的就应讲究史德。清朝史学家章学诚把“著书者的心术”称之为史德。他认为“险恶矫诬的人，不足以言史”。

我国历代王朝很注意修史，有个时期史官的地位很高，有所谓左史管行，右史管言，成了皇帝的监察官。一些有作为的皇帝，也鼓励写信史。浩如烟海的历史图籍，就是我们民族光辉历史的记录。历代史官和历史工作者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确实出过一些不畏权势，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史官，留下了许多为后人称颂的史德。尽管他们的道德标准同我们共产党人的道德观有着严格的区别，而且他们受时代的限制，不可避免地站在维护封建制度的立场上书写历史，但一

些正直的杰出的史官的史德，仍然值得我们党史工作者借鉴。

秉笔直书，被尊为史家的美德，也是评价“良史”的标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讲的春秋战国时代不畏权势，不怕杀头，敢于坚持历史真相的齐国和晋国杰出史官的故事。然而在封建社会里要做到秉笔直书，实在不容易。许多史官因此被砍头抄家，造成一幕又一幕历史悲剧。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正直的史官提倡和强调直书，甚至大声疾呼：“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晋书》中还说：“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取。”甚至对“诬书”、“秽史”的作者进行惩罚。梁代吴均写《齐春秋》，梁高祖认为不是实录，便将书稿全部烧掉，吴均也被罢了官。北齐魏收撰《魏书》，论亲疏而任意褒贬，史笔不实，死后被掘坟扬尸。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直书，仍然有积极意义。搞党史工作同样要有秉笔直书的精神。党史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它与一般历史科学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性。从时间上说，党史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昨天的事变同今天的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内容上说，它写的是现代的人和事。写历史本来就很难，写现代的人和事就更难。许多人还活着，有的还在历史的前台，有的虽已去世，但由于他们过去的权威和影响，人们往往有所顾忌。这就更需要有尊重史实、坚持真理、秉笔直书的勇气，真正做到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不为贤者讳。不为权势所屈而隐其恶，不为权势所诱而吹捧，不肯定一切，锦上添花，不否定一切，落井下石。历史是怎么发展的，就怎么写，功过是非，秉公而论。只要我们坚持秉笔直书，历史也会给坚持者

以历史地位，不然，就会有污青史，成为历史的罪人。

当然，我们强调秉笔直书，并不是搞客观主义。客观主义者研究历史也常常谈论历史过程的必然性，承认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但是，他们不去了解支配一系列事变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探讨社会发展的真正原因，不去认识历史的真貌，不是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采取纯客观的态度，事无巨细有闻必录。我们所讲的秉笔直书，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善于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找出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党史工作者的良好史德还表现在治史的严谨作风。古人治史严谨的范例也是非常之多的。司马迁作《史记》，20岁就南游江淮，跋涉沅湘，瞻望九嶷，游览汶泗，足迹遍及长江、黄河中下游，进行实地考察，搜集实物资料和口碑，力求在官府藏书之外，更全面地掌握资料。他在遭受酷刑的情况下，忍辱负重，给后人留下了一部纪传体的史书，也是一部文学珍品。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花了几十年时间，遍阅官私图书，除正史外，采集杂史达322种，广泛收集和整理了各种史料，最后组织撰写了一部完整的编年史。他们力求全面掌握史料，一丝不苟的治史精神，值得敬佩。无产阶级的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的治史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郭沫若写的《十批判书》，对甲骨文的精辟考证，对古代历史的深入研究，一直为后人所称道。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值得我们效法。今天，我们搞党史的条件是非常有利的，资料之丰富，口碑之

实在，设备之完善，是过去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但是，我们又应该看到，历史资料浩如烟海，有的日久年长，支离破碎，情节复杂，真假难辨；有的还因政治斗争的利害关系，进行了篡改、销毁、隐藏，保留下来的也不一定都很准确。这就需要我们周密调查，努力挖掘，深入研究，反复考证，用准确的材料作出正确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真正做到求实存真。

(三)

党史工作者要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和写作水平，讲究文采。

从事党史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一定的理论修养与写作能力，并有搞好党史工作的强烈责任感。许多同志还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参加者或见证人。有些同志虽然刚踏入党史工作者的行列，但求知欲旺盛，迫切希望迅速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党史工作者。

党史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需要广泛的知识，既要懂历史，又要懂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要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党的历史。要开创党史工作的新局面，关键在于学习。通过学习，提高理论修养、专业水平和写作能力，丰富知识，增强文采。

学什么呢？首先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提高理论修养。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社会、研究历史的锐利武器。掌握了理论武器，研究党史就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次，要系统地学习党的历史，了解党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了解党在各个

历史时期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历史经验与教训。懂得了昨天，就能了解今天，预见明天。熟悉了全党的历史，我们研究党史的立足点就高了，看得就远了，就能站在全党的角度来研究地方史，通观全局而纵览其余，就能清楚本地区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在整个党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还要学点中国近代史，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毛泽东在《怎样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中，就曾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胡绳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值得一读，为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条捷径。

一个好的党史工作者还应该有一定的文采，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文字水平。我们征集史料也好，研究党史也罢，最后总要写成文章给人看。文章写得好坏，有没有人看，直接影响到我们工作的社会效果。一篇好的史著，可以启迪人的心灵，激励人们前进。如果不讲究文采，就会把本来丰富多采的历史画面，写得枯燥乏味。所以，我们要尽量把文章写得准确、鲜明、生动，使人看了爱不释手，萦回脑际。有的同志认为，写党史文章只要注意史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就行了，至于文章生动不生动，无关紧要，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诚然，史实的准确性是文章的灵魂，而文笔的生动性也是文章的生命力之所在，两者不可偏废。

湖南这几年已撰写近百位党史人物传记，收获很大。其中很多是优秀作品，但也感到有个通病，就是概念化、模式

化，语言不生动，体裁不新颖，人物缺少个性。所以，发行量都不大。书店不敢多订，出版社不敢多印，读者很少问津。一本书辛辛苦苦劳动一两年，只出版几千万把本，有的还没有人买，岂不发人深思！为什么不能讲究点文采，把文章写得生动些呢？古人写史，就很注意文采。我们读《史记》，津津有味，就在于它所记人物个性鲜明，刘邦就是刘邦，项羽就是项羽。同样看秦始皇出巡，刘邦说：“嗟呼，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这两句话表现了两人的抱负和不同性格。两个传记，写出了两位英雄争霸天下、威武雄壮的场面，写出了英雄成败之所在。人物风貌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当然，《史记》带有文学色彩，历史人物传记能不能这样写，可以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司马迁的人物传记不是虚构想象的，而是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剪裁的。我们不提倡把党史人物传记都写成文学体裁，但在史实准确的前提下，运用一些最能反映人物个性的典型情节和典型事迹，把文章写得鲜明、生动些总可以吧！编史稿也一样，能不能突破一个模式，搞些史话和通俗读物，更加吸引读者，不是能够收到更好一些的宣传效果吗！

上面讲的党性、史德、文采，是根据湖南当前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情况而谈的。讲党史工作者的修养，当然不限于这几个方面。如果我们在党史工作中都能注意这几个问题，我想是有助于开创党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的新局面的。

(1983年1月)